

浙江佛教史

陈荣富 著



六台宗初祖北齊慧文尊者

出入山林間

莊嚴劫末有五百四千萬億那由其他諸佛
體今忽不見唯見我于愛經
我皮肉痛形骸而從中住
華嚴經

出版



大宋神宗七年甲戌歲春

卷第十九

孫

大藏經



本书得到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
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浙江佛教史

陈荣富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江佛教史/陈荣富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1.6

ISBN 7-5080-2455-9

I. 浙… II. 陈… III. 佛教史—浙江省 IV. 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5516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北京先锋印刷厂

版 次: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3.625

字 数: 650 千字

定 价: 4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 言

浙江省佛教协会秘书长 李祖荣

《浙江佛教史》一书，经陈荣富先生四年的辛勤工作，终于同读者见面了。此书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地记述浙江佛教历史的第一部史书，确是可庆可贺的。

浙江佛教历史悠久，高僧大德荟萃，影响广泛深远，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浙江是我国佛教传播较早的省份之一，至今约有二千年历史。浙江佛教历来高僧大德辈出，并创宗立说，见于经传史书的就有一千余人。高僧大德之多也是全国少有的。浙江佛教对中国佛教宗派，如天台宗、禅宗、三论宗、净土宗、华严宗、律宗的创立和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，影响到全国。浙江佛教还远传朝鲜（韩国）、日本，近代又传入欧美、南洋、澳洲。浙江的许多佛教名山大刹著称全国，乃至世界。浙江佛教大德著书立说，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。今天，我们研究浙江佛教历史，发掘佛教文化遗产，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正常发展佛教事业，开拓旅游资源，发展我省经济都是有益的，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陈荣富先生的《浙江佛教史》一书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《浙江佛教史》全书约五十余万字，共设十章，叙述了浙江佛教传播和发展的过程。综观全书，特点甚多。一是资料丰富。此书作者搜罗了历来佛教的著作、碑刻和前人的研究成果，特别是对近、现代浙江佛教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，收集了许多难得的资料。二是历史时限长。从佛教传入浙江，历代发展、变化，直至当

前,跨越年代两千年,这是一部浙江佛教通史。三是脉络清楚。此书以年代为序,以佛教宗派为脉络,对浙江佛教的事件和人物作了叙述,并突出重点,展示主题。四是内容也较广泛。此书以天台宗和禅宗为重点,但对其他宗派,如净土宗、华严宗、律宗等都有述及。同时,佛教与政治、经济的关系也有交待。此书对浙江佛教中的主要人物都作了介绍。这是一部内容较为丰富而广泛的著作。

由于本书跨越时限长,而浙江佛教的内容又多,特别是近、现代成文资料不多,搜集难度甚大,一些历史佛教事件和人物尚未能叙及,也在所难免。

我们一生热爱佛教文化,热心佛教事业,从事弘法工作,很想能有一本浙江佛教的历史。现在浙江佛教幸逢盛世,编写一本佛教史的确十分需要,意义重大。陈荣富先生的《浙江佛教史》问世,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,代表全省佛教界和热心浙江佛教事业的人表示感谢。

公元一九九八年五月于天竺山

导 论

本书研究和探讨的是浙江省佛教发展的历史。浙江在春秋时属吴、越二国,后并于越。战国属楚。秦为会稽及郢郡、闽中郡地(境内大部分属会稽郡,惟杭州及湖州西部属郢郡,台州、温州、处州属闽中郡)。汉为会稽郡东西南三部都尉及丹阳郡地;后汉为会稽、吴、丹阳三郡地。三国属吴,增置临海、吴兴、东阳及新都四郡。晋属扬州部。东晋又从临海郡中分出永嘉郡。南朝时期,曾从扬州部中分置东扬州部。隋朝置吴、杭二州总管府(改东扬州为吴州,废钱塘郡置杭州)及婺州、处州、睦州等,大业初(约公元六〇五年)改为会稽、余杭、东阳、永嘉、遂安五郡及吴郡。唐武德四年(公元六二一年)复改诸郡为州,置越州总管府;七年,改为都督;贞观元年(公元六二七年)属江南道;开元二十一年(公元七三三年)分属江南东道(领杭州、湖州、越州、明州、台州、婺州、衢州、睦州、温州、括州共十州);乾元初(公元七五八年)分置浙江东西二道。五代为吴越国,增置秀州。宋至道三年(公元九九七年)属两浙路;熙宁中(公元一〇六八——一〇七八年)分浙东西为两路。元代属浙江中书省。明洪武元年(公元一三六八年)置浙江行省处于杭州;九年,改为浙江布政使司。清代属浙江行省,共领杭州府、嘉兴府、湖州府、宁波府、绍兴府、台州府、金华府、衢州府、严州府、温州府、处州府、玉环厅。现浙江省管辖杭州市、宁波市、温州市、嘉兴市、湖州市、绍兴市、金华市、衢州市、舟山市、丽水地区、台州地区,面积十点一八万平方公里,人口四千二百三十四万余人。

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,它传入中国以后,碰到的是具有高度

集权的专制制度,高度发展的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,极度分散的广大小农经济以及多民族的辽阔地域。这些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立足、滋长、发展、兴盛、衰落的演变过程必有其共同的规律和特点。浙江佛教的发展,既体现了这些共同的规律和特点,又有源于自身的地理环境,政治、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个性,有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。本书力图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上展现浙江佛教发展的个性。

一、浙江佛教发展的诸阶段

佛教在东汉末传入浙江,经历了三国两晋南朝的传播和学派纷争;隋唐的兴盛和宗派并立;五代和宋代的极盛与江东佛教风格的形成;元以后的衰微与佛教的进一步社会化、世俗化;近代的求索与复兴;现代的劫难与盛世兴盛六个阶段。

(一)三国两晋南朝佛教在浙江的传播和学派纷争。

东汉末年浙江已有僧人活动的记载,但佛教在浙江流行是在三国时代。时浙江属占据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吴国。佛教传入吴国有两条路线:一是北线,为避战乱,许多教徒南下奔吴,代表人物支谦;二是南线,代表人物康僧会,天竺人,从交趾^①北上至建康(今南京),说服孙权信仰佛教,并兴建佛寺,“由是江左大法遂兴”。^②

到了东晋和南朝,佛教在浙江获得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,名僧涌现,议论佛理的名士辈出,佛寺倍增,灵隐寺、天童寺、阿育王寺、雪窦寺等中外闻名的古刹都始建于这个时期。其原因是:第一,永嘉之乱以后,北方兵乱不断,南方社会相对稳定;第二,江浙地理环境得天独厚,经济相对发达;第三,北方名僧名士先后在汉魏之间、

① 交趾包括广东、广西和北越大部分地区。

② 《高僧传》卷一《康僧会传》。

两晋之际和刘宋立国前后三次南渡,佛教人才南流,学术重心转移南方;第四,东晋、南朝历代统治者大都崇佛,支持佛教,使之得以自由传播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阐发和弘扬般若学思想的各种学派,共有“六家七宗”:即色宗、本无宗(含本无宗、本无异宗)、识含宗、幻化宗、心无宗、缘会宗。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活动于浙江,各学派自由辩论,自由争鸣。

(二)隋唐浙江佛的兴盛与宗派并立。

隋唐统治者大都崇佛,支持佛教的发展。隋唐时期,特别是唐代,经济发达,国力强盛,充满民族自信心,统治者有豁达开放的气度,允许各宗各派自由发展,互竞长短,这就形成了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。因而,佛教在两晋南北朝发展的基础上进入兴盛时期。佛寺和僧尼剧增,佛教进一步中国化,形成了三论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、禅宗、密宗、律宗、净土宗各宗并立的局面。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在绍兴嘉祥寺十多年,形成了三论宗的基本理论体系,人称嘉祥大师。智颀在浙江天台山创立我国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,对整个浙江佛教乃至全国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中唐之后禅宗、华严宗、律宗等相继在浙江发展和兴盛起来,涌现了许多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。

(三)五代和宋代浙江佛教的极盛。

浙江佛教在五代吴越国和宋代进入极盛时期。五代十国时期,吴越国历代钱王励精图治,保境安民,发展生产,使吴越国境内从未受战乱之扰,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经济发达地区。同时,历代钱王以“信佛顺天”为宗旨,以杭州为中心,大力提倡佛教,仅在杭州就兴建佛寺二百六十多座,礼遇各宗各派高僧,四方高僧纷纷云集杭州,使吴越国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中心。吴越国以前,浙江佛教发展的中心在绍兴、台州一带(均属会稽郡);吴越国以后,浙江佛教中心移至杭州。太平兴国三年(公元九七八年),吴越王钱弘俶采纳延寿禅师的临终遗言,归降宋朝,使吴越国免遭战乱的痛苦和

破坏,经济继续保持繁荣,业已极盛的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。一般认为,中国佛教至五代末宋初,即转入衰退时期,但就浙江而言,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,进入宋代后,浙江佛教持续发展,南宋建都临安(杭州)后,杭州成为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佛教的极盛一直持续到宋末。

吴越国时期,浙江最盛行的是法眼宗。进入宋代,全国律宗中心移至杭州;天台宗获得复兴;禅宗中的曹洞宗、云门宗获得发展,特别是临济宗成为禅宗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派;净土信仰成为佛教各宗派,尤其是天台宗和禅宗的一致兴趣和共同指归。

(四)元、明、清浙江佛教的衰微与佛教的进一步社会化、世俗化。

元代奉行喇嘛教,汉地佛教从总体上趋于衰落。元代汉地佛教以禅宗为主流,主要是曹洞宗和临济宗。曹洞宗盛于北方,南方禅宗均是临济宗,而元代临济宗最有影响的高僧,例如高峰原妙、中峰明本、云峰妙高、元叟行端、晦机元熙与笑隐大珙等均活动于浙江,同时天台宗和华严宗也继续得以传播。

明代浙江佛教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。禅宗中流行的主要是临济宗。明代中叶,浙江禅宗呈衰落态势,明末清初,浙江、江西禅宗重新活跃,这是禅宗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兴盛时期。明末出现了云栖株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和满益智旭四大高僧,他们都提倡净土归向。株宏被尊为净土宗第八祖,主要活动于杭州;智旭被尊为净土宗第九祖,主要活动于浙江。由于他们的提倡,净土修行的地位飞跃上升,净土法门进一步成为各宗共同的信仰,出现了许多净土会社。天台、禅、净相结合的“江东佛教风格”进一步发展,到明代更重实行而不那么玄想,更道德化而不那么理论化,日趋演化为一种民俗和风俗。

清代浙江佛教仍然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。清初,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并兴。雍正以后,禅宗明显衰落,其地位被净土宗取代。

念佛净土在江浙一带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,在禅宗日趋衰落的形势下,净土念佛法门成为佛教信仰的主流,不仅出家信徒信奉,在家信徒尤其信奉,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,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。

(五)近代浙江佛教的求索和复兴。

由于朝廷的腐败,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,近代中国面临“向何处去”的问题,浙江许多思想家、政治家和佛门弟子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这一中心问题,从佛学中寻找思想武器。涌现了章太炎、范古农、吴璧华、马一浮、丰子恺、夏丏尊等等著名居士以及寄禅、谛闲、太虚、弘一、印光、宝静、芝峰、兴慈、静权、摩尘等杰出的近代高僧。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,他们创办佛学院,成立佛学组织,创办佛学刊物,著书立说,奔走呼号,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,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。他们从佛学中寻找和挖掘理论武器,使长期沉寂的佛教义学研究受到重视,佛学各宗在浙江重新活跃。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、律宗、密宗、禅宗、净土宗均有名家研究和弘扬。但各宗都殊途同归,都指归净土法门。特别是太虚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向人们展示了佛教发展的新方向。

(六)现代浙江佛教的劫难与盛世兴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经过千百年流传,历经沧桑的浙江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,经过整顿的佛教曾出现过喜人的景象,但随后出现的“左”的政策,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,使佛教遭受了巨大的摧残和破坏。公元一九七八年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开始纠正“左”的宗教政策,平反佛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;归还被占用的寺院;招回了被驱逐的僧尼;恢复和重建各级佛教组织;整修或重建寺庙,开放重点寺院;发展佛教教育事业,注重培育僧才,提高僧尼素质;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,积极开展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,浙江佛教重新兴盛。

二、浙江佛教在中华佛教史上的地位

(一)浙江是中国佛教发展最盛的省份之一。

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浙江后,由于浙江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、经济环境,使佛教在浙江获得迅速发展。两晋南北朝时期,北方战乱不断,江南社会相对稳定,北方的名僧和名居士三次大南迁,大批佛教优秀人才云集江南。许多人首先来到京都建康和扬州一带活动,但官场和社会的倾轧与险恶,迫使他们最后大多移居浙东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是春秋古城,也是当时经济、文化中心之一,人杰地灵,钟灵毓秀,素有文化教育的传统,对名僧和名人雅士极有吸引力。两晋南北朝时,中国文化中心南移,浙江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佛教文化中心。在中国佛教史上,这个时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,大都活动于浙东。

隋代天台宗的创立,更突现了浙江佛教在全国的地位。智顗把“北禅”和“南义”融合成“止观并重”的一乘佛教天台宗,成为中国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。它典籍丰富,理论体系深厚,受到隋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扶植,是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一个佛教宗派,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吴越国和宋代,杭州成为我国东南部的佛教中心,被誉为“东南佛国”。吴越国建都杭州,四代钱王崇佛,在境内广建佛寺,使吴越寺庙“倍于九国”。至宋代,杭州佛寺增至三百六十座,故苏轼诗中有“三百六十寺,幽寻遂穷年”之句。

元代汉地佛教主要是禅宗临济宗,其活动中心是浙江天目山,所以浙江天目山实际上成为元代汉地佛教的中心。

普陀山寺院始于五代。梁贞明二年(公元九一六年)建不肯去观音院。宋神宗元丰三年(公元一〇八〇年),神宗诏令改建,并赐名“宝陀观音禅寺”,以后虽不断扩建,但规模不大。明代屡建屡毁,至清代和民国的扩建,形成普济、法雨、慧济三大巨刹和全山皆

寺(全山清代有庵二百四十座,民国 有庵八十八座,茅蓬一百二十八座)的格局,成为全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被誉为“海天佛国”。

不仅如此,浙江有许多享誉四海的千古名刹,历经劫难而不毁。例如,杭州市有灵隐寺、净慈寺、上天竺法喜寺、中天竺法净寺、下天竺法镜寺、余杭径山寺、建德玉泉寺等;宁波市有天童禅寺、阿育王寺、七塔寺、雪窦寺、保国寺、观宗寺等;天台山有国清讲寺、华顶讲寺、高明寺、方广寺等;绍兴市有炉峰禅寺、下方桥石佛寺、五磊讲寺、新昌大佛寺等;普陀山有普济寺、法雨寺、慧济寺等;湖州有道场山万寿寺等;金华有双林寺等;天目山有禅源寺、昭明禅院等。

(二)浙江佛教史上高僧辈出,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,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过程中,经过移植与融合、顺应与同化的复杂过程,到两晋时,阐发和弘扬般若学思想形成了“六家七宗”,其代表人物都是当时的高僧。例如,即色宗代表支遁和郗超,本无宗中的本无异宗代表竺法潜和竺法汰,识含宗代表于法开,幻化宗代表道壹,心无宗代表竺法蕴,缘会宗代表于道邃等,这些高僧主要活动于浙东。当时的名居士孙绰、郗超、王羲之、殷浩、谢安、许询以及稍后的谢灵运、沈约、周颙等也都主要活动于浙江。

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,在各宗的创立和发展史上,浙江高僧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天台宗是高僧智顗于陈太建七年(公元五七五年)率弟子二十余人登上浙江天台山,结庵习禅而创立的。智顗入灭后,起承上启下作用的灌顶大师,唐代中叶中兴天台宗的湛然大师,唐末把天台宗传授给日僧最澄的道邃大师,宋代复兴天台宗的义寂、义通、遵式、知礼等大师,明代中兴天台宗的传灯大师、智旭大师,近代弘传天台宗的谛闲大师、宝静大师等都是浙江高僧。

武则天时期,法藏和尚创立华严宗后,不久便面临夭折。在华严宗的历史上起拨乱反正、承上启下的作用,使华严宗得以继续弘传的高僧是杭州灵隐寺法铎和尚的弟子、越州(今绍兴)人澄观。宋代复兴华严宗,使之再度辉煌的是杭州慧因寺(即高丽寺)净源大师。

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是浙江吴兴(今湖州)人,其最信任的弟子文纲是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,文纲最负盛名的弟子道岸常居会稽龙兴寺。正是通过文纲、道岸及其弟子的弘传,南山律宗才得以盛行。五代以后全国律宗的中心移至杭州,在杭州弘律的著名律师是大昭庆寺的允堪和元照。近代专注弘传律宗的是浙江高僧弘一法师。

在禅宗发展的历史上浙江禅师更是层出不穷。牛头禅在禅宗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,牛头禅发源于江苏,但主要在浙江发展,其著名禅师有杭州余杭径山寺法钦,唐代宗手诏赐“国一国师”号,还有道林禅师、惟则禅师等。

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门下有五大宗匠,即青原行思、南岳怀让、荷泽神会、永嘉玄觉、南阳慧忠。其中永嘉玄觉和南阳慧忠都是浙江高僧。玄觉禅师系浙江永嘉(今温州)人,是最早在浙江弘传曹溪禅的禅师,其所著《永嘉集》、《证道歌》是禅宗史上的重要著作。慧忠是越州诸暨(今浙江诸暨市)人,曾在浙江四明山、天目山等名山遍游,后被皇帝请入宫中“待以师礼”,被尊为国师。

禅宗在发展中形成“五家”,即沩仰宗、临济宗、曹洞宗、云门宗、法眼宗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,浙江高僧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青原系的发展史上起关键作用的道悟禅师是浙江东阳人;曹洞宗的创始人洞山良价是越州诸暨人;云门宗创始人云门文偃是浙江嘉兴人;法眼宗的创始人法眼文益是浙江余杭人;使法眼宗在吴越国盛极一时的德韶国师是处州龙泉(今浙江龙泉县)人,他被钱王奉为国师;被誉为“曹溪后第一人”的永明延寿禅师是浙江余杭

人,其洋洋八十万言的著作《宗镜录》和《万善同归集》是禅宗史上的重要著作。宋代以后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,浙江是其最主要的活动地区。在浙江活动的临济宗高僧有宋代的爱国僧人大慧宗杲、无准师范;元代的高峰原妙、中峰明本、云峰妙高、元叟行端等;明代的楚石梵琦、愚庵智及、觉原慧昙、季潭宗泐等。在浙江弘传曹洞宗的高僧有天童正觉、真歇清了、天童如净等。

浙江是净土信仰最盛的省份之一。一般认为,净土宗的历代祖师是:慧远—善导—承远—法照—少康—延寿—省常—株宏—智旭—行策—实贤。在上述十一代祖师中,从第五代少康到第十一代实贤,全部主要活动于浙江。少康是浙江缙云县人,主要活动于浙江建德乌龙山;延寿是浙江余杭人,主要活动于杭州;省常是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,在杭州昭庆寺结“净行社”;株宏是杭州仁和(今属杭州)人,居杭州云栖寺;智旭是江苏吴县人,主要活动于浙江,晚年居浙江灵峰;行策是江苏宜兴人,曾长期在杭州弘传净土法门;实贤是江苏常熟人,二十四岁在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后,一直活动于浙江。近代净土宗大师印光曾在浙江普陀山居住二十五年,其许多弘传净土的著述都是在普陀山完成的。

(三)浙江高僧在佛教理论上多有建树,在佛教史学上贡献卓著。

浙江山川秀丽,清静幽雅,人杰地灵,素有文化教育传统和著书立说的风气,佛门也是如此,高僧中不乏饱学之士,在佛学理论和佛教史学上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早在东晋,活动在浙江的“六家七宗”代表人物支遁等高僧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作;隋代智顗大师为创天台宗,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,主要有“天台三大部”,即《法华玄义》、《法华文句》和《摩诃止观》,各二十卷,共六十卷;唐代中期,湛然法师为中兴天台宗,不仅对天台宗的基本理论,即天台三大部作了注释,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发展了天台教义;宋代复兴天台宗的义寂、义通、知礼、智圆也多

有著述。

在禅宗发展史上,唐代永嘉玄觉的《永嘉集》和《证道歌》享有重要地位;吴越国永明延寿八十万言的《宗镜录》和《万善同归集》,对后世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,吴越忠懿王亲自为《宗镜录》作序,清雍正朝收入《御选语录》;宋代灵隐寺云门宗僧人契嵩著述丰富,达六十多万言,其《传法正宗记》、《传法正宗论》和《传法正宗定祖图》、《辅政篇》等在佛教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浙江高僧在佛教史学上的贡献尤其引人注目。中国佛教史上流传于世的四大《高僧传》全部出自浙江高僧之手。《梁高僧传》著者梁代高僧慧皎,浙江上虞人,长住会稽(今绍兴)嘉祥寺;《续高僧传》著者唐代浙江湖州高僧道宣;《宋高僧传》著者宋代浙江德清高僧赞宁,奉诏撰于杭州灵隐寺;《大明高僧传》著者如惺,常住浙江天台慈云寺。此外,道宣还撰有《广弘明集》、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、《大唐内典录》、《天台六祖略传》等共二百余卷,这些书在中国佛教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;赞宁还撰有《大宋僧史略》,记载了佛教事物和典章制度的起源和沿革,对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有重要价值。

浙江天台宗僧人著有许多天台宗史方面的著作。主要有《释门正统》,著者宗鉴,钱塘良渚(今浙江余杭良渚镇)人,该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传体佛教史,也是最早的天台宗史;《佛祖统纪》,著者志磐,四明(今浙江宁波)人,该书体例完备,资料广博,内容丰富,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通史;《天台九祖传》,著者浙江僧人土衡。

此外,还有《五灯会元》二十卷,明州(宁波)奉化僧人普济撰;《武林西湖高僧事略》,杭州西湖玛瑙寺住持文敬和寺僧元复撰;《乐邦文类》,四明(今浙江宁波)天台僧人宗晓撰;宗晓还撰有《四明尊者教行录》。

近代浙江高僧太虚大师、圆瑛大师、巨赞大师、印光大师等也有许多宝贵的著述。

(四)浙江佛教的独特风采对佛教发展史的影响。

东晋南朝时,南迁的名僧、名居士云集浙东,他们为了在南方思想界获得一席之地,便注意把般若学和玄学结合起来。浙江战国时期属楚国,受楚文化影响颇深。《楚辞》、《老子》以及后来受《老子》影响的庄子,都带有楚文化的鲜明特征,玄学所讨论的问题多为老庄哲学中问题。东晋南朝时,浙江形成了般若学和玄学相结合的学风,名僧与名居士相交游的风气,名士与名僧竞辩玄理和佛法,各个学派自由争鸣的和谐气氛,营造了浙江佛教独有的风采,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。无论是隋代的天台宗、三论宗,还是中唐以后的禅宗,都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独特的风采。

浙江佛教发展到宋代,形成了天台宗、禅宗和净土宗相结合的“江东佛教风格”。在浙江有深远影响的天台宗主张圆融统一,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天台、禅宗和净土信仰的圆融统一。天台宗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岳慧思和北齐慧文,而慧文和慧思都是禅师。天台宗的止观学说,可以说是禅宗形成以前禅学发展的集大成者,同时,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也提倡口唱阿弥陀佛名号。可以肯定,江浙一带之所以盛行净土念佛法门,是同天台宗的影响分不开的。到了吴越国时期,永明延寿积极倡导禅净合一、禅净双修,受其影响,北宋禅僧纷纷仿效净土。北宋的天台宗僧人几乎也都兼修净土,净土信仰成了佛教各宗的共同指归,形成了以天台、禅宗、净土三者相结合为特征的“江东佛教风格”,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。这种风格通过统一后的北宋王朝而影响全国,为明、清佛教继承和发展,并演化为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。

浙江佛教的另一个特点是一贯倡导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。早在三国东吴时期,到浙江弘传佛教的康僧会就主张“儒典之格言,即

佛教之明训”，^① 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另一蹊径。东晋南朝的名士把般若学和玄学相结合，就是把佛学和老庄相结合。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对儒家的经世伦常也是持肯定态度的，他认为如果抛弃“周孔经典”，抛弃“孝以治家，忠以治国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敬上爱下，仁义揖让，安于百姓，霸立社稷”，就势必“疆者陵弱，天下焦遑，民不聊生”。^② 智顗反对把道家学说和佛教相提并论，但对道家学说也不排斥。唐代把华严宗推向盛兴的高僧澄观，更是主张会通内外典籍，兼容儒道之论，认为“儒道言同，皆佛法也”。^③ 吴越国时期的永明延寿也主张三教调和，他认为“儒道仙家，皆是菩萨，示助扬化，同赞佛乘”。^④ 主张以佛教为中心，调和儒道。宋代灵隐寺僧契嵩始终致力于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的调和融合，其《辅政编》的中心就是要“广引经籍，以证三家一致”，认为三教名目虽异，但目的一致，“圣人为教不同，而同于为善也”。^⑤ 宋代天台宗僧人智圆，也竭力主张儒佛合一，三教同源，并自号“中庸子”。他主张“以宗儒为本”、“修身以儒，治心以释”，成为宋代佛学思想儒学化的代表人物。浙江佛教的这个特点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规律和趋势，同样也给佛教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。

（五）浙江佛教在佛教文化对外交流中的特殊贡献。

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，海岸线长，自古海上交通发达，与日本一衣带水，与高丽（朝鲜）和东南亚各国早有贸易往来。南朝以来，浙江政治相对稳定，经济发展迅速，佛教随之兴盛，名僧辈出，名刹林立，特别是天台宗的创立，使浙江佛教举世瞩目，吸引了许多国家，尤其是日本和高丽的僧人前来学习，浙江亦有许多高僧东

① 《高僧传》卷一《康僧会传》。

② 《法华玄义》卷八。

③ 《华严经疏钞悬谈》卷二四。

④ 《万善同归集》卷下。

⑤ 《辅教编中·原教》。